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中国历史研究 (中)

韩文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韩文主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5634-1722-2

I. 中…

II. 韩…

III. 历史知识—少年读物—课外—中国

IV. Z2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1159 号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延吉市公园街 105 号 邮政编码 133002)

中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 开 450 印张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1188.00 元(本卷 16.50 元)

目 录

◎陇右文化圈的形成与陇右文化特征.....	1
◎秦直道及其兴废历程.....	6
◎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轨迹.....	14
◎清前期文化的时代特征.....	22
◎“礼”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29
◎年号的起源和命名.....	36
◎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	38
◎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禁娼.....	51
◎中国史上的大同、小康之说.....	62
◎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	69
◎文化史视野中的盗墓故事.....	75
◎从图腾到祖宗.....	87
◎龙骨坡文化.....	96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	108
◎武王伐纣的正确日期.....	115
◎克孜尔千佛洞：古龟兹与中国第二敦煌.....	124
◎唐末食人考.....	132
◎古代的“红衣大炮”.....	153
◎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155

◎《永乐大典》还能否完整地重现于世	168
◎生态环境恶化是明灭亡主因之一	172
◎板桥越狱	175
◎百年西夏学.....	178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184
◎我国古代货币的六次重大演变.....	187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189
◎我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与发展.....	192

◎ 陇右文化圈的形成与陇右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地域文化概念中的“陇右”一词，具有广、狭二义；而广、狭二义下的“陇右”概念，正好体现了地域与地区二词在文化视野中的差异。狭义的“陇右”，实为甘肃的代名词，如果从文化圈或文化带的历史形成与分布来看，实际上不足以构成一种具有独立文化特征与自足文化品格的地域文化。严格意义上的陇右文化圈，当指广义的“陇右”。广义的“陇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主要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之地，大致上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唐朝时，曾设陇右道，为全国十道之一，辖境即今陇山以西至新疆东部一带地区。就地理范围而言，“关陇”所包括的地域比“陇右”小，而“河陇”所包括的地域则与“陇右”略等；就文化圈所处位置而言，陇右文化圈正好处在西域文化圈与三秦文化圈的交界地带。因此，“陇右”尽管是一个具备了古已约定俗成和人为界定双重性质的历史区域，是一个较为精确的历史地理范围，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的代名词而言，其内涵则要宽泛、丰厚得多，而

其文化特征也极为复杂。

作为历史概念中的陇右文化，它所体现的丰厚的文化内蕴，正是在陇右独具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社会结构和陇右人的社会实践与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衍变的结果。而这种具体体现着陇右人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由于受典型的高原地貌、风寒干燥的气候条件、短缺的地表径流和相对贫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的影响，陇右古代居民强烈的生理需求与难以满足的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从而形成陇右古先民固有的自强精神和突出的自我意识。驾驭并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陇右人内在气质的核心，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充满生气活力，不拘一格，刚毅豪放。与此同时，农牧文化的影响在陇右文化中也体现得很充分，循规蹈矩、保守念旧、容易满足。可见，受独特自然环境影响的陇右文化，是封闭与开放的双重变奏。

进入历史时期，陇右基本上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伴随着历史的脚步，陇右地区也加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陇右成为华夏文

化与西域文化扩散、交流与融合的交接点。可见，陇右文化的大发展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地域和民族的构成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吸取营养。明清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在长期扩疆拓土和域内空间分异缩小的过程中趋于定型，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类型的陇右文化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则更多地表现出文化的趋同性。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首先促成了陇右文化的渗透性与包容性特征。在这里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与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是在浅层互动系统，进而由组织联系进入社会系统，扩展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要，又体现了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民族间的交往与渗透，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却异常艰辛，有时甚至是民族大迁徙与民族消亡的不幸。陇右地区的民族交往史证明：不同地区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形成了相互的认同和理解，与此同时，通过民族间的交往凝结成的不同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对祖国的情感，又维系着历史上国家与外域的关系，维系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地与边疆的联系，维系着国家的统一。不难

理解，所谓渗透是指陇右地区文化、精神间的渗透；所谓包容则是指陇右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海纳百川般的气度，以及它对各种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其次，陇右文化特征还在于其创造性与延续性。陇右人民是富于创造活力的人民，在盛传于陇右大地的伏羲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中，已透发着勃勃的创造生机；近代以来在陇右大地不断发掘出的大量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劳动工具、房屋、墓葬等文化遗存，均是陇右先民创造精神的体现；而那些绚丽夺目的彩陶艺术、石窟艺术，则更是陇右文化充满创造活力的象征。正是这种创造精神，才使陇右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也才使陇右文化独具特色。所谓陇右文化的延续性，也正是在这种创造精神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陇右民族中，羌、氏、戎，甚至党项均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变，但其文化性格与品质却至今仍记录在我国的典籍中，其风俗习惯至今还渗透、保存在陇右民风。陇右文化的延续性特征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陇右大地作为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人类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地域文化就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并在中国早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华夏文化发展为汉文

化并形成汉文化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陇右文化始终伴随着汉文化的扩散吸引而趋同；又因人口流动，民族迁移，统一与分裂的波动而趋异。陇右文化依赖地域之便，东与属于中原文化的三秦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得以流传发展，加快了陇右文明的进程；陇右地处中西交通的要道，西与属于沙漠、草原类型的西域文化毗邻，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正是在这里得以与汉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可见，陇右作为黄河上游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是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陇右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比较，它具有更多的汉文化特征；与三秦文化进行比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陇右文化是从三秦文化到西域文化整个西北文化带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两方又自成体系。一旦具备适宜文化发展的条件，各种形式的文化都有可能在这里发芽。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为三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所以，陇右文化又带着复杂的民族色彩和过渡性特征。多元融合的陇右文化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

◎ 秦直道及其兴废历程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护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联系，对于全国的水陆交通建设十分着力，除了以秦国和山东六国故地的旧有道路为基础广治驰道以外，还陆续兴修了南起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北)、北抵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的直道，以及联系西南夷地区的五尺道和沟通岭南地区的兴安运河(灵渠)等一系列的水陆交通路线。

直道与驰道虽然都是秦王朝全国陆路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驰道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 年)在秦故地与六国境内的旧道基础上兴修的道路网，而直道则是三十五年(前 212 年)为防御匈奴新建的专用军事交通线。但目前学术界多将直道与驰道混为一谈，简单地认为直道是秦驰道网中的一条道路，甚至有人以秦直道为秦将蒙恬所修则必经蒙恬驻地上郡(治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南)为由，断定秦直道是由秦代经过上郡的驰道改建而来(王开主编《陕西古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版)。这是因为，在秦直道修筑的起讫时间与工程分期，经由路线及其兴废历程等一

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诸多不同看法，值得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一、秦直道确与驰道无关

关于秦直道的始筑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皆有明文记载，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当了无疑问。不过秦直道究竟完工于何时？修筑秦直道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史籍语焉不详。学界一般根据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七、八月间胡亥等人曾经由直道南返咸阳市断定秦直道即竣工于这一年，也就是认为秦代修筑直道只用了两年半时间(王开主编《陕西古代交通史》)。实则这样的结论并不合乎历史情况。《史记·蒙恬列传》云：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司马迁既然明确说“道未就”，可见当秦始皇崩逝沙丘，蒙恬含冤而死之际，直道并没有竣工。这样的推论还可以找到其它的证据。据《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矫诏僭立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繇无已。”这说明发端于秦始皇的直道工程，实与阿房宫工程一

样，一直持续到二世时期。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史记注》条谓：“始皇崩于沙丘，乃又从井陘抵九原，然后从直道以至咸阳，回绕三、四千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虽君父之尸臭腐车中而不顾，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顾氏之语虽然尖刻，但却道出了当时的实情。

看来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出巡天下时，原本可能也有从新开辟的河南地南返咸阳并视察直道工程进展情况的打算，但东游途中暴崩沙丘则为其始料未及。二世为避天下疑揣，选择尚未竣工的直道南归，确为当时具体情势所迫。大约是亲历直道后，颇受其中颠簸之苦，秦二世日后才有了续修直道的举措。结合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夏直道已经可以粗通车马的情况来看，秦直道工程乃肇于始皇而成于二世，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至秦二世三年(前 207 年)，历时约五年之久，其中前二年多为第一期工程，虽粗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二年多则为第二期工程，修缮之后，直道才完全竣工。秦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 年)兴修驰道，次年即可“东行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驰道网如

此迅速就得以形成，主要是借助了秦故地与六国境内的旧道基础，直道则明显不同，因为完全是新开的道路，加之修筑于子午岭峰巅之上，“堑山堙谷”，工程相当繁杂艰巨，故修筑工作历时稍长于驰道。

司马迁虽然明确地记载了秦直道的起迄地点和里程，但遍检《史记》全书，却无法发现云阳与九原之间任何其它的具体经由地点，这为后人留下了一桩千古遗案。所幸后来的地理志还保留了一些相关记载。据唐代初年成书的《括地志》记载，庆州华池县(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华池镇)西 45 里子午山上有秦时的故道。唐中后期的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说：“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年(引者按：当作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1980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万分之一 0·N·C(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片上，显示出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山脊上确有古道路存在，这应是《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秦故道”，亦即秦直道。经过近 20 多年来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实地调查，秦直道的具体走向和经由路线已基本清楚。

秦直道由云阳林光宫首途，就进入甘泉山。甘

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直道离开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中，循岭北行。经今陕西省旬邑县东的石门关，北行至凤子梁，再经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庙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岬、南站梁，而至今陕西省旬邑县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直道循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过陕西省黄陵县艾蒿店、甘肃省襄乐县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甘肃省合水县的黄草崾岬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沿伸，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岬。然后纵穿华池县境，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岬、高崾岬、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崾岬、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岬、墩梁，直达营崾岬。营崾岬是秦直道与明长城的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明长城内侧向西北沿伸，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白鬃出长城，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岬，重合之处长达 20 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过东胜市西的二顷半、海子湾、城梁，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在此渡过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秦直道确实与秦上郡驰道无关。秦直道作为一条新修的特殊道路，是由九原直通云阳，并未绕道经过上郡，全长“千八百里”，约合今 700 余公里，其道路北口与南口大体南北相对，所以才有“直道”的名称。

二、秦直道的兴废历程

秦直道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势力南侵而兴筑的，所以与秦长城一样，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程。早在秦昭王时期，秦国的北部边界就已扩展至黄河南岸，与黄河之北的赵国的云中郡隔河相望。为了巩固边防，秦昭王曾在秦国北陲修筑长城，由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北行经上郡之北，又东北蜿蜒至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秦统一六国后，版图既已扩展，旧日的长城随即失去了本来的作用。这时匈奴的气焰还没有完全低落，于是秦又新筑长城，西段沿用秦昭王旧城，中段和东段则因用赵、燕长城的故迹加以增葺，首自临洮，循贺兰山、阴山山脉，东至辽东，东西绵延万余里，创造了世界奇迹。三十五年(前 212 年)又使蒙恬修筑直道，不迂回上郡和云中，而由云阳北出直抵九原。新筑的直道与新修的长城呈丁字相交，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京畿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

系，使得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秦朝灭亡以后，直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汉初年，匈奴贵族势力曾两度试图进犯关中，其中一次入萧关，直抵雍县和甘泉。既然匈奴奴隶主有意窥伺甘泉，为什么不从九原直接南下，却要远远绕道六盘山下？在子午岭的东西，分别是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游牧民族南下侵犯中原地区，一般都是取道河谷。而当时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都没有受到骚扰，这又是什么原因？推究其实际情况，正是子午岭上增添了一条直道，使得匈奴贵族不能不有所顾虑。他们虽然暂时控制了河南地，也不敢长期盘踞。当时匈奴左贤王曾一度占据阴山和河套地区，但不久又复撤走，就是这个缘故（《史记·匈奴列传》）。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自泰山复东至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书·武帝纪》），所走的正是直道。这次巡幸，司马迁曾经随行，故而能将直道的起讫地点明确记载下来，并说“行观蒙恬所为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李斯列传》），对秦人开辟直道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历史总结。西汉时期不仅积极利用秦时所修的直道防御匈奴南犯，而且对于直道的维护也曾有所着

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县和除道县，这两县正分别设在子午岭段直道的南北两端，显然是为了加强对直道的控制。

唐朝建都于长安，强大的突厥族雄峙于漠北，频繁南侵关中。唐太宗时期，突厥一次进犯，十万铁骑直达渭河岸边，兵锋威逼长安。后来唐王朝转守为攻，再夺河南地，设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控制阴山防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直道联系北边诸军要镇的作用仍显而易见。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旧是一条通途，清朝初年才渐趋湮塞。据乾隆《正宁县志》：“此路一往康庄，修整之则可通车辙。明时以其道直抵银、夏，故商贾经行。今则塘汛废弛，通衢化为榛莽。”不过又据正宁刘家店子林区和旬邑石门关的当地老人回记说，数十年前，刘家店子林区的古道一直通向定边，平时驴驮马载，络绎不绝；石门关至马莲河一段子午岭的主脊凤子梁，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必经之路。每当运花季节，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粘花带絮，一路皆白。

解放战争前，石门关为陕甘宁边区后期部队所在地，设有大型储粮仓库，凤子梁更成为转运军需粮草的大路。这些事实说明，自唐代以后，随着政